

路遥的“残酷”人生观及其文本呈现

韩欣桐

内容提要 路遥在其写作和演讲中多次提及“对自己残酷一点”的人生理念，忍受苦痛和牺牲甚至自找苦吃去实现目标的行为模式鲜明地呈现在他的写作姿态和生活方式中，但这一人生观并不独属于路遥个人，它是社会潮流与个人历史交汇后的产物，潜藏着意识形态上占据话语权和合法性的时代话语。对路遥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创作进行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其“残酷”人生观的内核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社会转轨发生了从维护集体主义到实现个人价值的转换。对路遥创作文本中所呈现的人生观的分析，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路遥，还为探索时代发展的精神理路提供了有效路径。

关键词 路遥；人生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时代转型

一 “对自己残酷一点”的人生观

如果对路遥的生平经历和写作姿态略有了解就会发现，有两个词高频出现于路遥对自己工作、生活的描绘以及他人对路遥的评价中，那就是“残酷”和“牺牲”，这两个词几乎可以被当成描摹路遥生命历程和生活态度的关键词。路遥不断用充满悲壮感的语气讲述以“残酷”为核心的人生理念，例如在《作家的劳动》中，他为作家创作困境给出的建议是：“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1]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给青年学生所做的演讲中，他再次重复了自己的“残酷观”：“你要真正干一件事的话，你不要批判别人，首先批判自己，就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还应该怎么做，对自己要严厉一些。我曾经有一句话叫：对自己应该残酷一些。”^[2]甚至路遥对足球这项体育运动的喜爱也与“残酷”相关，“你不能对自己太温情，要求要严格些。我喜欢看踢足球，我觉得对自己要凶狠些，就像踢足球那样，哪怕一脚踢过去腿都折了——但也有可能不折”^[3]。对自己残酷的具体方式，则是为了既定目标有所“牺牲”。作为一个作家，他倡导牺牲家庭、健康等其他生活选项的全力

以赴的工作态度，他将作家这项工作定义为“苦行僧”，要成为一个作家，“他需要牺牲的东西很多，譬如家庭生活等”^[4]。朋友对路遥的描绘，同样充斥着“残酷”和“牺牲”。在朋友眼中，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诚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5]。他“为了写出无愧于高水平的作品，常常处在一种紧张的心态和牺牲的生活中”^[6]，以一种“玩命”^[7]的态度来生活。

关于路遥“残酷”和“牺牲”的讲述和被讲述多是围绕他的写作事业进行的，他的自传式文章《早晨从中午开始》对“残酷”人生观进行了集中呈现，总体而言，是将崇高的目标——通过文学创作获得历史认可^[8]，与个人的自虐式的奋斗相结合，由此“展示给世人一个‘以文学为生命第一要务’的‘圣徒’形象”^[9]。虽然很多其他作家的艰辛劳作也展现了“残酷”的一面，例如柳青，但像路遥这样有着清晰而略显刻意的自我设定的人却并不多。更应注意的是，路遥的“残酷”和与之相应的“牺牲”并不局限于文学事业，他潜意识中的“残酷”与其说是一种对崇高文学事业的献祭姿态，不如说是路遥人生态度的总体概括，是他实现人生目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

忍受痛苦和牺牲去实现目标的行为方式，在

路遥的童年就已初露端倪。路遥幼时家贫，被父亲王玉宽送到大伯家做养子。父亲从大伯家离开的场景让路遥记忆犹新，他在演讲中描绘了这一场景：

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扔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趁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10]

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强忍跟随父亲回家的冲动，选择留在陌生的家庭，路遥解释了内心的动机：“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11]这段叙述的潜在含义是，一个学龄稚儿早早认识到上学对自己的人生意义，并且能够为了达成目标忍耐离开双亲的痛苦。这意味着，幼年时期的路遥就已经学会为了目标做出某种取舍。作为一个后设的回忆性问答，路遥的讲述或许有某种构建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这是一种构建，也依然传递出了路遥对承受牺牲和苦难去实现人生目标这一生存理念的认可。实际上，路遥青少年时期的一些行为足以显示，在他的认知和行为逻辑里，已经形成了承受牺牲和痛苦，竭尽全力实现所设定目标的思考路径和实践方式。路遥小学毕业后，养父便不再允许他读书，为了上中学，路遥想尽一切办法，先是说服家人参加了初中统考，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录取通知书，在养父依旧反对他读书的情况下，路遥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俊宽寻求帮助^[12]。经历一番波折终于成功入学的路遥，依然有无数苦痛需要忍受，其中之一就是饥饿。路遥把个人经历融入《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平凡的世界》中，与小说主人公一样，他一方面要完成学业，另一方面需要承受饥饿和贫困的

夹击。贫穷、饥饿和远离双亲的困苦对一个少年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但路遥以极强的忍耐力自虐般将它们承受了下来。在友人的回忆中，路遥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立世态度：“我们这些人，说到底得靠挣死命、吃大苦在社会上争一席之地，别无其他。……不得巨大的悲怆，如何能得巨大的快活？”^[13]于是，他的“残酷”人生观的完整模型是：通过忍受苦难，甚至是自找苦吃，来获得某种自我实现。

路遥认同柳青在《创业史》中的观点：“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14]在路遥人生的紧要处，除了入学读书，在写作事业的完成过程里，路遥同样践行着他的“残酷”法则，这种残酷甚至是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1987年，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时，路遥忽然吐了一口血，去医院检查病因，“结果是非常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15]，但是，路遥非但没有停止写作，反而隐瞒病情，继续投入小说第三部的创作。路遥的好友白描认为路遥隐瞒病情大概是“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以病恹恹虚弱的印象”^[16]，但这个推测也许并不是根本原因，他在散文《早晨从中午开始》里提及曹雪芹和柳青以表达对不能完成长篇巨著的遗憾^[17]，实际上这种遗憾更多的是路遥对自身能否实现创作目标的担忧，相较于自身形象和身心健康，路遥更在意的是能否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哪怕艰辛的劳动加速生命的消耗也在所不惜。

虽然路遥为了实现自身目标不惜付出一切，但他并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在部分处于公开状态的书信里可以看到路遥对他人的很多无私帮助。他全力提供发展机会并毫无保留地分享创作经验，正如黄河浪在回忆中所写：“据我所知，他给许多人解决过困难，分担过忧愁，甚至利用繁忙的创作之暇设法为不少人介绍和调动了工作，有的写信，有的打电话，也有他亲自奔波的。”^[18]同时，他对家人也倾尽其力，想方设法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例如他多次写信给海波诉说自己帮助二弟“四锤”（王天云）进城工作之事^[19]，还帮助三弟王天乐进入铜川矿务局工作，继而成为《延安日

报》的记者，后又进入陕西日报社工作。但是，当乐于助人的性格与设定好的人生目标相冲突时，路遥会牺牲与目标不相干的事物，全身心地投入对既定目标的追逐，例如路遥为《平凡的世界》做准备时，就曾因“冷落”家乡的业余作者而受到抱怨，“当时他已开始酝酿《平凡的世界》，往往处于急躁焦虑的状态，乐于独处、烦于频繁的来访，以致一些家乡的业余作者遭到‘冷遇’，向我诉说路遥待他们不够热情”^[20]。得知这些作家的反应时，“路遥略显沉默，看得出他心里很不平静，有苦难言”^[21]。表面上看，路遥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忽略了他人的需求，而实际上，从路遥的角度来说，他是在压抑自己乐于助人的性格秉性。路遥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一个路遥裂变为两个，一个是不断前进的冷酷意志，一个是温良的自然人性，前者不断压迫和催促着后者，而建立在分裂之上的“残酷”人生观仿佛天然存在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把持着“前进”“牺牲”等话语符号的“我”毫不费力地压倒了另一个“我”，驱策着主体不断前进。尽管“家乡的业余作者”对路遥的行为颇有微词，但实际上，路遥忍受苦痛集中全力去实现目标的行为方式是为社会广大群众所接受乃至推崇的。如果翻阅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在西安矿院所做的演讲的文字记录就会发现，每当路遥谈到应该对自己残酷无情以及他艰苦卓绝的写作过程，现场便不断响起掌声，这是大众对成功者的认可，更是与路遥在人生观上的共振。可以说，路遥的“残酷”人生观不只是文学姿态更是人生理念，不只属于个人，更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集体性特征，是某种在意识形态上占据话语权和合法性的时代话语。这一话语被路遥以实践、写作以及演讲清晰地呈现和总结了出来，路遥不断强调着，“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22]，“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23]！这些鼓励性的语句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多重历史语境交汇下的产物，在社会变迁中存在着独属于这个时代的迁延。

仅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对他的“残酷”人生观进行分析是难以触及丰富性的，我将从路遥的作品入手去发掘这一理念的特征和发展变化。

二 文本表达与价值转换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现代派、先锋派等各种艺术思潮风起云涌，路遥却坚守着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他对真实性的重视远胜对其他艺术风格的尝试。他认为“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24]，因此，路遥的文学创作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以虚构为主的文本中存在一个“真实”的路遥，也就是说，路遥的创作中沉积着他的内在世界最为深沉的部分——他的生存理念和价值判断，正如路遥自己所表述的：“我从来不记什么故事，自动淘汰，生动的留下来，认为自己生活最深切的方面，写作时最能激情勃发，词如泉涌。”^[25]路遥的“对自己残酷一点”的人生观也时时从其文本中显露出来，构成了他笔下主人公的生存方式，甚至成为命运的重要推动力量。

路遥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诗歌起步的。自60年代末起，路遥发表了《塞上柳》《车过南京桥》《老汉走着就想跑》《灯》《走进刘家峡》《电焊工》等十几首诗歌。这些诗歌语言朴拙，与革命话语紧密结合。“克服外在困难去获得成功”是路遥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例如在《塞上柳》中，他用比喻的方式描绘了困难，“塞上狂风紧，黄沙滚滚流”^[26]，而革命战士就应如同塞上的柳树，“狂风骤雨何足惧，永做塞上一棵柳”^[27]；《灯》同样使用风雨为意象来隐喻需要被克服的困难，“小油灯啊小油灯，不怕狂风吹，不怕暴雨淋”^[28]；《桦树皮书包（叙事诗）》中依然是以外在困难的严峻来衬托英雄主义，“那是一个雨后的晚上，/ 长征队伍在草地上跋涉。/ 这里变幻的气候，/ 真像一个残酷妖魔”^[29]。这些相似的写作程式和主题，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严苛的外在环境被设置为需要抵御的敌人，这一创作思路与当时的社会斗争局势密不可分。1962年9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被提出，敌我斗争的战斗氛围笼罩了社会，但“正在成为斗争对象的这些阶级的性质和地位基本上仍是模糊的”^[30]，也就是说，这一斗争口号变成了某种笼统的理念，人类历史上沿袭已久的以敌我划分为基础的二元思维模式在此时被进一步强

化。这种笼统的战斗思路进入了文学创作世界，变成了某种泛化的意识形态，正如路遥的诗歌所展现的那样：建设时期的外在困难就如同阶级敌人一样需要被抵抗和猛烈攻击，个体与环境的关系被等价于敌我关系。

应当注意的是，在“敌我对立”的思考模式里，路遥把个体本身也设置为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对象，个体的一部分同外在的苦难一样，被视作外在于主体的“他者”，这是从路遥创作中可以找到的最初的隐含着“残酷”人生观的思想痕迹。例如在《老汉走着就想跑》这首诗中，年龄和病痛等本属于个体之一部分的要素，是需要个体发挥牺牲精神去克服和承受的，惟其如此才能实现革命事业的目标：

年过六十不服老，/干活尽往人前跑，/明明感冒发高烧，/送肥他专捡高山巅……/支书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吵”：/咱队今年过《纲要》，/等靠老天过不了；/革命就要拼命干，/嘿，老汉走着就想跑！^[31]

“发高烧”代表的是某种疾病，衰老则是肉体的痛苦，路遥把这两者视为外在于肉体的要素去加以抵抗，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以“清扫内奸以御外敌”为目标的社会规范：“疾病或身体的痛苦都视为外物的侵入所致，维护身体界限的和谐不使外物进入，就成为重要的价值所在。”^[32]对身体“内外”的界定，对疾病和身体的痛苦加以抵抗，正是战争思路在生理学和文学上的体现。对肉体的透支，往往与实现集体的目标密切相关，这种需要对“自我”进行残酷“压迫”的美学的合法性在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中即可被观察到，“小腿疼”和“吃不饱”这种肉体上的痛苦被以戏谑的方式指认为对集体事业的损害，路遥所强调的“不服老”和“发高烧”也正是以集体事业为最高目标而进行自我牺牲的文学创作思想的变体^[33]。

但是，相较于20世纪50年代的赵树理等作家的创作以及路遥自己早期的诗歌，路遥后来的作品（主要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展现的“对自己残酷一点”的“自我牺牲”的理念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生成了不同的维度。首先，所牺牲的对象

不再局限于肉体 and 财物等物质性要素，他将笔触延伸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追寻目标意味着需要强迫自己放弃某种价值观，也就是说需要颠覆的是内心世界的原有秩序，这一点在小说《人生》中有突出的表现，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做出选择后产生了强烈的不安：

后来，他强迫自己不朝这方面想。他在心里自我嘲弄地说：“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

他尽量使他的心变得铁硬，并且咬牙切齿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34]

“对自己残酷”的前提是存在两个“自我”，一个倾向于按照“良心”去生活，另一个则可以为了前途不择手段，这两个自我所代表的价值系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只有一个自我战胜了另一个才能过得更好，内心世界实际上变成了看不见的战场。

在这种自我交战中，摧毁原有价值观对高加林来说是痛苦的，但实际上，刘巧珍才是分手事件中最大的牺牲者，在伦理约束极强的环境中，女性的声誉被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刘立本的二女子这下子算彻底毁了：她就是不寻短见，恐怕也要成个精神病人。因为谁都知道，这种事对一个女孩子意味着什么；更何况，她对高玉德的小子是多么的迷恋啊”^[35]！但是在高加林的这一段内心状态的描写里，“所有的人”都能想象到的巧珍的悲惨境遇却不在他的考量之中，视野开阔读书广博的高加林却仿佛成了一个不知乡村道德伦理的外地人，在内心的自我搏斗中竟没有为刘巧珍的未来考虑。这种对于他人的牺牲的忽视和对自我牺牲的看重，体现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这种个人主义的内心独白体现出的是路遥的“残酷”人生观有别于50年代的“牺牲话语”的第二点：如果说路遥在70年代的创作尚延续着集体主义的血脉，那么到了80年代，路遥笔下的牺牲已经不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路遥的书写更多体现了被“集体记忆”所压抑的“个人记忆”，“无论是孙少安办砖厂还是孙少平求学打工，都不再像‘梁

生宝买稻种’那样是肩负集体的使命，而只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活人’”^[36]。虽然进入80年代，路遥的文本依然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一样使用了统一的话语符号，但它们所指向的目标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集体的满足，一个是个体的自我实现。

如果继续深入观察路遥所着重刻画的心灵折磨，也就是价值观的搏斗和更新，会发现路遥个人在人格上的审美倾向：主人公主动在不同价值观之间进行选择，继而用新的生存逻辑指导人生规划，显示了某种精神上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路遥所创造的人物身上随处可见，例如高加林在巧珍和亚萍之间进行的选择，孙少平在省城和煤矿之间的选择。但是，在人物暂时无法改变自身命运时，路遥也通过某种“自虐”使人物在苦难中显示出作为主体的力量感。在《人生》中，高加林失去教师工作不得不下地务农，他拿出了拼命的姿态在田地里劳作，双手起泡流血到将镢把都染红。《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主人公马建强同样如此，在无力缓解饥饿时，他也并没有因此放弃努力，同样拿出惊人的毅力去复习功课：“死就死吧，这么不争气，活着又干什么？”^[37]也许在路遥的心中，他所倡导的“残酷”人生观内蕴着一种强者哲学：主体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要显现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哪怕他没有选择的权利。

当路遥的创作从70年代推进至80年代，表面上看，文本中所呈现的“残酷”人生观与“十七年”文学中所倡导的牺牲精神相通，实则他已经将这一精神的内核完成了“偷梁换柱”，从对集体事业的追求转换为个人目标的实现，并为这一萌动着个人主义的思想理念点染上不屈的生命能量和感人的奋斗精神。道德审判和偶像崇拜两种态度是无益于深入靠近路遥的“残酷”人生观的，它在路遥个人身上，以及在他所创造的文本里都有丰富而复杂的呈现，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细致考察。

三 个人历史与社会潮流的互动

一个人形成一套生存理念，除却天生的性格禀赋外，与童年经历有密切的关联。幼年的路遥忍受

了贫寒、饥饿和读书的艰难，这些苦难带给路遥心灵上的创痛，形成了他倔强、坚韧又充满自虐倾向的性格。路遥从六七岁时就体会到了孤独，环境给他的认知是，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能够依靠的，“小时候出去经常被别的孩子打得鼻青脸肿，跑回家里，一般的孩子希望得到大人的保护，寻找大人的安慰，但是我回来，还要被大人另外打一顿，理由是你为什么出去惹别人。……尽管你年龄很小，但是你不可能有任何依靠”^[38]。没有依靠，就意味着路遥需要咬紧牙关直面痛苦，与生活中的困难对决才能有活得更好的希望。除了无人可依，路遥的生存还需要面对自尊心的折损。贫穷对一个敏感要强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由于家穷身上总是又脏又破”^[39]，想获取精神娱乐更是奢望，看电影只能钻肮脏的下水沟去逃票，路遥甚至觉得青少年时期的自己是从下水沟一步步爬出来的，爬下水沟这个行为，被路遥看成是“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象征”^[40]。即使路遥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获得了城市户口，与北京知青建立起家庭，成为著名作家，青少年时代的心理创伤却一直留在他的内心深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分析的，童年的孤独和屈辱使路遥对人和事充满不信任，“对现实中人和事的怀疑，使路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这使他在一系列的个人和社会活动中，都流露出一种紧张感”^[41]。

除了个人成长经历，社会氛围和政治话语同样在鼓励着“残酷”人生观的形成。这一人生理念，本质上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战斗，这种将自我设置为敌对势力并主动发起进攻的思维方式，很难说不是革命战争年代所使用的抗争性话语，以及曾经的阶级斗争思想在个人身上的显化，“敌我斗争”被路遥转化为了“自我搏斗”，牺牲自我的一部分去获得目标的实现。但是，对路遥“残酷”人生观的塑造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路遥的创作期恰好横跨中国社会发生激烈转型的年代，他的“残酷”人生观除了受到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受社会巨大转型所带来的观念变革的浸透。

实际上，路遥是以一种非常鲜明的方式将新旧精神价值的转换融汇进文本中的。放眼世界，路遥的“残酷”人生观其实并不新颖，在路遥所喜爱并

反复阅读的文学经典中，可以发现许多牺牲自我或他者去获取成功的人物形象，例如在与高加林的精神内核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于连和拉斯蒂涅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残酷”和“牺牲”在为个人目标服务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拉斯蒂涅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惜盘剥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当他收到亲人寄来的款项，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与高加林牺牲巧珍时相似的良知的谴责：“这些至诚的感情，可怕的牺牲，将要成为他达到德·纽沁根太太面前的阶梯；想到这些，他不由得落下几滴眼泪，等于献给家庭神坛的最后几炷香。”^[42]同高加林一样，拉斯蒂涅受到来自农村的女性的无私支持，但有意思的是，在这表面的相似之下又隐藏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把《人生》和《高老头》两个文本对读，就会发现相较于拉斯蒂涅，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进行选择时，心灵冲突更加集中于对自己的说服，他的关注点在于“纠偏”曾经的“人生观”，他使自己的心由柔软变得“铁硬”，为了“伟大的前途”是可以“牺牲”“良心”的，也就是说，在高加林身上发生的是价值观的颠覆，他需要用残酷的态度斩断曾经的历史，去创造崭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而这一点——价值观之间的搏斗与更新，在于连和拉斯蒂涅身上却并不明显。高加林精神上的自我斩断与更替，其实正是时代精神发生变化时在个体身上的投影，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虽然路遥所创造的人物的发展道路在大框架上类似于西方的成长与情感教育的小说模式，但是本质却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从他自身的社会和历史才能寻求到更合理的解释”^[43]。不同于于连和拉斯蒂涅诞生的社会历史境遇，路遥笔下残酷的内心搏斗是生成于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它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心位移的文学记录。

近距离观察诞生《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社会环境，80年代的中国正在进入重大转型，这种转型改变了旧有经济模式，新经济模式所强化的资本主义成分召唤着“鼓励消费、社会流动性和追逐地位”^[44]等倡导个体发展的内容，这一转变继而冲击了原有道德体系和生存理念，束缚于集体的个人开始为自身发展寻找更好的出路，不曾被旧有意识形态容纳的个人主义因素开始获得合法存

在的缝隙，正如程光炜教授所言：“在一个重大转型的中国，任何这种非常自私、功利和顽强的精神气质都是受到鼓励的，是被允许的，有时候甚至是可以逾越各种道德和法律栅栏的，因为这种历史语境需要千百万像他们这样的人去支撑、去响应、去拥戴，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也来自于此。”^[45]大众拼搏奋斗的目标开始更多着眼于个人而不是集体，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便诚实地展露了这一奋斗目标的变化：《基石》（1973）里歌颂为桥梁建设身负残疾舍生忘死的宁大伯，《父子俩》（1976）中农家子弟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决心留在公社支持农村建设，《在新生活面前》（1979）中老铁匠为了工厂机械化改革废寝忘食地学习新技术，而到了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将目光聚焦于自身，为了寻求自我发展去当揽工汉而不断在劳动中锤炼自己。沿着路遥的创作会发现，他投射于文本中的“对自己残酷一点”的拼搏姿态没有任何变化，甚至人物塑造也基本一致，《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与《父子俩》等前期作品不过是“前世后生”^[46]，但是“残酷”人生观的内核和实质已然跟随新意识形态的普遍降临而发生了剧烈转变。

不仅从路遥个人的作品中能够看到这种转变，时代变化的痕迹同样可以从路遥与其文学前辈的比较中被观察到。路遥对于柳青和杜鹏程的欣赏不仅是写作姿态的相似，在路遥的心目中，他们身上存在着同样的“一旦献身于某种事业，就不会顾及自己所付出的代价”^[47]的牺牲精神，路遥在他的文学前辈身上看到了自己，形成了精神资源的确认以及强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由于所处年代的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时代使命的不同，使他们以相似的生活姿态完成了截然不同的梦想，正如他们的文学创作主题所呈现出的差异：《创业史》描绘集体劳作模式的建立过程，《保卫延安》讲述解放战争这一人民集体事业的完成，而路遥进入80年代之后的创作则渐渐偏离了集体，沿着展现个人奋斗命运的路径前进，并在精神气质层面与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相合，正是由于其创作跟随了历史的脚步，历史便给予了他回报，即阅读的热潮。

结 语

希利斯·米勒认为，小说词句、主题、动机、人物以及事件上的“重复”现象暗含着“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48]，对重复现象的研究是深入理解作家和时代的有效方式。对于路遥来说，城乡交叉地带青年的命运是其反复讲述的主题，但这并不是路遥唯一重复讲述的内容。在路遥的整个人生和创作历程中，反复出现的要素还是他的“残酷”人生观。这一人生理念的重复是路遥的个人经历和时代氛围同时作用的结果，从贫寒中一步步走入城市并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在实现人生理想的过程中，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生活态度的正确性；而这正确性与从革命战争年代便传承下来的牺牲奋斗精神彼此融汇且呼应共振，生成了个人历史与民族大历史交融重叠的意识产物。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意识产物并非是凝固不动的，在路遥以“残酷”与“牺牲”为特征的人生观里，发生了双重转换：首先，对自己残酷一点，牺牲自我的意义由实现集体的利益转换为达成个人的目标；其次，所牺牲的要素也从物质和肉体转换为内在秩序——旧有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路遥创作中道德伦理层面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人生》中所体现的“传统道德和现代社会的冲突”在《平凡的世界》已经“完全和解”^[49]。但是，这一观察仅仅局限于小说的文本层面，却没有意识到，路遥的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和错位非但没有和解，反而进一步割裂：一方面“十七年”文学书写中的“牺牲自我奉献集体”的思路依然留存在路遥的脑海中，如在《平凡的世界》结尾，孙少平抵挡了省会城市带来的诱惑，果断选择回到煤矿去当工人，他带着对全人类的关心走向充满危险和黑暗的煤矿^[50]；另一方面，80年代鼓励个人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个体无力抗衡的，于是孙少平的原型王天乐在路遥的帮助下走出煤矿，实现了高加林的梦想，成为城市中的一名记者。事实上，路遥的创作既有对传统道德和传统革命话语的继承，也有面对新的政治经济环境所产生的心灵阵痛，小说文本中的和解——如孙少安、孙

少平个人追求与道德伦理的和谐统一，并不意味着阵痛的结束，而恰恰是价值观存在某种分裂的标志。为了集体的崇高选择仿佛只能在文学世界里落地生根，文学想象与现实情境出现了错位，原有的意识形态对群体来说早已失去了控制力，而新的意识形态因其个人主义特征浓厚而难以获得彻底的合法性，人们只能置身于摇摆不定的分裂中，并在这充满现代性意味的分裂中寻找着理想的发展之路。这正是路遥的“残酷”人生观的内核发生转换之后所引发的精神难题。

于是，在路遥被继续推崇的今天，新的问题被遗留了下来，新旧意识形态之间的分裂是否已经被成功弥合？当下的个体应如何设计自己的人生观和成长道路？青年的满腔热忱和活力投向了何方？这些问题也许不是文学能够回答的，但是文学依然有可能提供新的社会呈现方式和对未来的想象，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继续思考。

[1][23] 路遥：《作家的劳动》，《早晨从中午开始》，第92页，第9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2][38][40] 路遥：《文学·人生·精神——在西安矿学院的演讲》，《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74页，第283页，第285页。

[3][4] 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一）》，《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27页，第127页。

[5]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王愚：《“文章憎命达”——忆路遥二三事》，《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第15页。

[7] 参见刘路《坦诚的朋友》，《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第10页。

[8] 路遥在写给曹谷溪的信里说：“除过该交的朋友，少交往，少结识，埋头读书，写点东西，归根结底，人活一辈子，最重要的还不是吃好、穿好、逛好，而应该以辉煌的成绩留在历史上为荣。”参见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第157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9]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10][11] 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早晨从中午

开始》，第210页，第210页。

[12] 参见厚夫《路遥传》，第3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 张子良：《斯人去矣 光彩依然——回忆路遥》，《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第43页。

[14] 白正明：《路遥的的大学生活》，《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第4页。

[15]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第333页。

[16] 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第242—243页。

[17] 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早晨从中午开始》，第413页。

[18][20][21] 黄河浪：《远去的背影》，《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第276页，第274页，第276页。

[19] 参见路遥《致海波》，1979年12月4日，《人生（路遥全集典藏版剧本·诗歌·书信卷）》，第17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22][24] 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61页，第262页。

[25] 路遥：《漫谈小说创作——在〈延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10页。

[26][27] 路遥：《塞上柳》，《人生（路遥全集典藏版剧本·诗歌·书信卷）》，第143页，第144页。

[28] 路遥：《灯》，《人生（路遥全集典藏版剧本·诗歌·书信卷）》，第153页。

[29] 路遥：《桦树皮书包（叙事诗）》，《人生（路遥全集典藏版剧本·诗歌·书信卷）》，第158页。

[30] 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 路遥：《老汉走着就想跑》，《人生（路遥全集典藏版剧本·诗歌·书信卷）》，第142页。

[32] 黄子平：《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第1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33] 同处于这一写作脉络上的还有茹志鹃的《百合花》。

《百合花》与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同样发表于1958年，在小说中，作为群众的新媳妇牺牲个人的珍贵财物去支持集体的解放事业。

[34][35] 路遥：《人生（路遥全集典藏版长篇小说卷）》，第147页，第16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36]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第17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7] 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在困难的日子里》，第25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39] 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二）》，《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68页。

[41] 贺智利：《路遥的个性心理》，《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42] 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傅雷译，第281—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3] 黄文倩：《生活在他方——重读路遥的〈人生〉》，《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44]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第5页，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45][46] 程光炜：《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47] 路遥：《杜鹏程：燃烧的烈火》，《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39页。

[48] 参见希利斯·米勒著《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前言”第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9] “孙少安、孙少平没有了高加林的复杂处境和矛盾选择，个人追求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剑拔弩张的，而是体现出和谐的统一”。参见王鹏程、唐明星《路遥小说的道德空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50] 孙少平在回煤矿之前买了一本书，名为《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即使个人即将回到黑暗危险的煤矿，他依然优先考虑集体的利益而非个人的前途和安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罗雅琳